

重返“听觉”:听觉研究中的众声协奏 ——“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曾 斌¹, 易丽君^{1 2}

(1. 江西师范大学 叙事学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2 2. 南昌工程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9)

2015年12月25-27日,“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召开。研讨会由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联合协办。与会学者围绕“听觉与文化”这一核心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听觉与文化等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大千世界“声音”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重返“听觉”,强调的是人类的多元感知平衡,重回到被遮蔽的艺术现实、创作现实和批评现实。当下,对于“听觉与文化”的探讨便极具价值和必要性。人类对于外界信息的接触依赖于各种感觉器官,各方面达到一种平衡性,正如加拿大学者梅尔巴-卡迪所言:“耳朵可能比眼睛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对世界的认识,但感知的却是同一个现实。具有不同感觉的优越性在于,它们可以互相帮助。”^[1](p456)]但是,书籍、影视、网络等使人类对“看”的依赖持续增加,视觉的过度运用已经对其他感知方式构成了严重的挤压。在此情境下,西方学术界对以视觉为中心的“图像主义”提出了批评,要求恢复听觉感知的应有位置。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当中的重听传统也得到了重新审视。国内听觉叙事研究的先行者、本次会议的发起人傅修延教授指出,各民族都将听觉沟通作为人类交流的主要途径的原因:其一,声音对情感具有催化作用;其二,相对于视觉而言,听觉更具有生理上的优势;其三,视觉沟通向听觉沟通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其缘由在于声音具有“点对面”的特性。^[2]听觉叙事的意义就在于“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3]得益于众多学者热情洋溢的研究和富有成效的探索,听觉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增多,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所谓的“听觉转向”。在当前研究中,听觉与视觉、听与伪听、听与非听、听觉与文化、如何“矫枉”又不“过正”等等,是当代“听觉转向”中面临的新课题。此次“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正是针对当前听觉研究中出现的诸情况、新问题而展开。

本次会议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一是会议的议题系统集中,讨论包括听、听觉、声音与意义、声音与文本、声音与图像、听觉与视觉、听觉与文化等涉及听觉的理论问题,还包括专门的听觉叙事研究。二是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理论探讨大胆深刻。无论是资深学者还是中青年学者,都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发表了对于听觉及其与文化的独特见解,学者们的真知灼见为该领域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提交论文和大会发言的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现综述如下:

一、听觉研究的基本问题探讨

从重视听觉发展到以视觉为中心,再到当下理论界对听觉的重新关注,其中经历了一系列转变。这种转变引发了学者们对一系列概念的思考与探讨,比如听、听觉、声音、意义、脑文本、听觉叙事等。当代

收稿日期:2016-02-16

作者简介:曾 斌(1976-),男,江西万安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叙事学与民族文学。

易丽君(1979-),女,湖北武汉人,南昌工程学院教师,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听觉研究中涉及哪些基本概念、范畴,要解决哪些理论问题?本次研讨会中,与会专家首先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听”、“听觉”的内涵与外延是此次研讨会聚焦的重要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在其提交的会议论文《说“听”》中认为,“听”是唯一与人的生命相始终的感觉,汉语中的“听”有时候也指涉听觉之外的其他感知。声音的发生与生命繁衍有密切关系,国人在涉及两性关系时常用声音譬喻。声音的转瞬即逝要求接受者集中注意力,人类听觉的相对“迟钝”反而有利于增强思维的专注和想象的活跃。听觉往往比视觉更能触动情感,人类沟通之所以会从视觉符号(手势)向听觉符号(语言)演化,原因在于后者更有利于较大范围内的全天候沟通。傅修延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叙事学研究,曾提出“听觉叙事”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术语,如“聆察”、“拟声”等。此次会议中,他又提出了“幻听”概念,并结合《红楼梦》等具体文本作了细致的分析,引发了在座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听”作为一个动作存在,它连接着声音和意义,更富意味的是“觉”,一切文化皆由意义开始。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赵毅衡教授的大会发言《关于意义问题的几点思考》认为,首先要对“意义”进行思考和探讨,他认为不同的文化社群有不同的意义世界,物世界与意义世界的不同关联方式构成了三重的复合世界:实践意义世界、自在物世界、思索世界。人的意识作用于部分物世界而形成的实践意义世界是人的意义世界的重要部分,人类通过认知、理解判断和改造取效三种推动来实现意义的实践化。同时,人类的意识通过幻想和筹划两种方式来构筑整个意义世界。“听觉”也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实践活动,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必须要追寻意义,我们对“声音”的探讨也应当从“意义”出发。

“听”连接着声音和意义,那么,人的大脑是怎样固化稍纵即逝的声音并形成蕴含意义的文本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聂珍钊教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研讨会上宣读的研究成果《口头文学:有关脑文本、声音和语言的思考》,认为口头文学不仅涉及到文学的起源问题,还涉及语言、文本、文学创作、文学传播等一系列问题。口头文学只是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即用口头表达了一种文学文本。因此,需要思考在书面文学出现之前,通过口头表达的文学或文学文本在哪里?如果没有这种文学或文本存在,口头是无法表达文学的。聂珍钊教授从文学的起源问题——口头文学谈起,进而提出“脑文本”的概念和思考逻辑。他指出人是通过把感官的感觉作为记忆存储在大脑里形成脑文本,再通过回忆并借助发声器官将脑文本转换为声音形式表达出来,或是借助书写工具通过某种能够表达特定意义的符号将脑文本转换成可见的文本。在此过程中,声音是表达脑文本的媒介,而语言是通过人的发音器官以声音形式表达的脑文本。脑文本就是通过记忆存储在大脑中的文本,它通过回忆并借助人的发声器官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这个脑文本,就不可能有通过口头表达的文学。

声音固化成脑文本,那么,能否从脑文本形成的图像中听出声音呢?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的报告《诗歌的图像修辞及其符号表征》从诗歌的图像修辞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在诗意图中“绽开”与“屏蔽”二元组合如何形塑其格式塔特质。密闭在语言符号中的诗意被切换到图像中直接绽开,但是所绽开的只是“诗眼”,也即是“撷取”最能表征诗意并可以被转译为视觉图像的部分,而并非诗意的全部,在使诗眼绽开的同时也屏蔽了图像背后的世界。这种语图之间的开阖有序煽动了诗意在图像中的若隐若现,这也即是诗意图的双重性及其符号表征意义之所在。文学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重新“倾听”经典能够发掘出长久以来被我们屏蔽掉的“声音”,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在探讨了听与听觉、声音与意义、声音与文本及图像的关系基础上,讨论听觉与文化便有了足够的理论铺垫。很多与会专家对中国文化中的“听”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溯源与追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王小盾教授在题为《夜对于上古中国人的意义》的报告中以大量墩墩汉墓出土文物的图片为例,向大家详细讲解了这些图案与上古神话的对应关系,尤其是补充了近期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照片进行对比,令人耳目一新。他还以殷商甲骨文中的记录论证了上古的科学文化是属于夜间的,继而从“掩蔽效应”这一角度细致入微地对瞽矇和眡矇进行了区分,指出了听觉和夜的一种深刻关系:听觉是在进入黑夜或某种神秘境界之后,才获得其特殊形式,因而结成凝寂虚无的心境。上古中国人是在同视觉相对比的意义上建立对听觉的认识。随着农业发展和定居生活的成熟、知识和信息的增多、记录方式的变化,视觉文化的上升和听觉文化的下降表现为某种历史趋势。视觉文化虽然具有更为鲜明的工具性,更适合进行理性表达,更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但是听觉是一种内在的能力,比视觉更接近人类的童年和人

的本性,更易于抵达智慧。

对于人类远祖文学的思考与探索引发了多位专家的积极响应,西安音乐学院的罗艺峰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文子〉的“听道”与中国“听”的传统》的报告,他从文献资料上对中国文化中的“听”进行了追溯,认为战国时期的《文子》是我国首部完整提出“听”的哲学的重要文献。这一文献不仅提出了“听道”的总纲,将“听”分为耳听、心听和神听三个层次,还提出了“听”的目的。这种“听道”既是对先秦丰富的观点和思想的总结,同时又影响了后世“听”的传统。除了对中国文化中的“听”进行理论梳理,与会专家学者们还对中国文化中“声音”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蒋晶在其报告《声音文化与听觉回归——从音乐角度看》中认为,声音作为人观念中的情感与诉求的具体表达,影响了文化的生成;可听与不可听的音景让我们了解到不同族群的声音世界观;以“聪”代“明”的盲人音乐家用乐打通了听觉和视觉的障碍,声音在此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音乐家与观众及队友之间默契的交流。

古人的智慧和中华文化的积累是当代人珍贵的思想宝藏,但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金惠敏研究员作了题为《论“内通”非“通感”——道家通感论与钱钟书的误读》的报告,认为钱钟书将庄子的“耳目内通”与文艺学上的“通感”简单等同是对道家通感论的误读。他认为道家通感论既是一个文艺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通感”属于庄子“内通”的初级阶段,而“内通”则是对“通感”的扬弃,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同时他期望大家借此契机深入研究道家通感论,并勾勒出其基本结构或特征。

通过专家们对听与听觉、声音与意义、声音与文本、听觉与文化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与会者领略了曾经一度被遮蔽的“听觉”的无限魅力,也激发了与会学者对于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新思考。对于“听觉”基本问题的探讨为听觉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助于将听觉研究推向纵深发展。当然,这些理论是否有效有待于回到文学现场进行检验。

二、“听觉”与“文化”的理论思考

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文化传播广泛而影响深远,当代影视、网络的迅猛发展带来社会的巨大进步,更把人类带向了图像至上的极端境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显得“虚无缥缈”,人们不知不觉忽略了听觉感官的效能和意义。传媒理论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很早就在其《理解媒介》中关注到了这一倾向,特别提出了“听觉空间”的概念。声音、听觉与文化讨论的必要性就在于人类就生活在一个声音的世界中,听觉文化渗透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消除既有视觉文化至上的弊端,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人类生存环境。对于听觉与文化的理论思考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

对于听觉和其他感官的关注和强调,显然是对视觉在当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及其后果的反思与反抗。中国人民大学的耿幼壮教授在大会发言《召唤与召命》中指出,当前比反思和反抗视觉在当代思想和文化中占据支配性感知能力更为紧迫的任务是探寻其成因,并找到相应的对策。他认为真正产生实质性变化的并不是视觉感官本身,而是视觉形象或观看的对象在性质上出现的畸变。只有改变视觉形象本身,才有可能恢复各种感官和感知能力的平衡与和谐。因此,探究听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诗学和文化任务,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和政治任务。耿幼壮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王馥芳教授的呼应,她在大会发言《听觉互动之于文化的建构性——基于“图像至上主义”的文化破坏性》中以聋人文化为出发点,从“图像至上主义”之于文化破坏性的极端原型范例——聋人文化所展示的五个交际偏好模式出发,详细分析了“图像至上主义”终极发展之于文化的两大潜在破坏性恶果:完全“消灭”听觉行动和解构诸多社会文化规范,并在探讨两大潜在破坏性恶果基础上反观听觉之于文化的建构性,强调了听觉互动之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敦副教授也支持以上观点,他在《“声音”和“听觉”孰为重——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的发言中指出,文化理论、文化研究中的“听觉”或“声音”议题,尽管在文艺理论、传媒学、艺术史等的互动下逐渐受到关注,但能够用来展开有效讨论的话语框架仍然匮乏。他以视觉文化研究话语框架为借鉴,对“声音”和“听觉”进行了深入的研判:听觉性议题比声音性议题更有讨论的价值,声音问题包含在听觉问题之内。他认为对这两个词语的辨析与取舍是当前听觉文化研究基本话语建构

的关键,也是当务之急,听觉文化研究建构的方向在听觉而不是在声音。

听觉文化研究的发展理路也是众多在座专家学者关心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定家研究员作了题为《格拉提亚的觉醒——浅谈超文本语境中的互文性理论》的报告,从超文本语境中的互文性理论分析与研究引发了是否存在“互听性”的思考。“互文性”说到底还是文本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彼此对释、意义共生的条件或环境,超文本打破了书面世界的环境限制,赋予了互文性以鲜活的生命,就如同皮格马利翁唤醒格拉提亚一样,超文本解放了被书本“纸封”的互文性,使沉睡于书页中的死文字,变成了欣悦自由的活文本。但网际写作,文本的主体隐藏 IP 之后的“假面舞会”之中,原创性已经不起“递相祖述复先谁”的叩问,“作者之死”已成为数字化写作的“常态”。尤其在超文本语境中,滚屏阅读,“文无所本”,在热链接交织成文的超文本状态下,读者以拟作者的身份博弈文本主导权,读与写的界限更加游移不定,不再有独立的文本,只有文本中的文本。他认为既然人说话所使用的语言是及物的,那么声音之后就一定要有图像呈现,反之,有图像也就一定会有一些潜在的声音。东北师范大学徐强教授在题为《当代汉语文学里的声音世界——断想与札记》的报告中与大家分享了他阅读大量文学作品时所作的札记,分别从作家的声音创作、作品中人物的声音叙事、听知觉叙事、象声词、声音形式等方面对各种文本中的声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为大家关注当代汉语文学里的声音世界提供了很多新的观测点和研究思路。

“听觉转向”已日渐成为中西学界的共识,恢复视听平衡的呼吁日渐声高,诚如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我们需要通过建立一个与“视觉空间”感知相异的“听觉空间”来治愈这种视听失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陆正兰教授对“空间”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她在题为《论音乐—空间文本——一个跨媒介符号学分析》的报告中具体分析了音乐—空间双文本组成的全文本中的四种亚型:从古到今的空间功能为主音乐为辅的仪式音景、现代出现的普泛化的音乐为主空间为辅的“音乐场所”、空间被影视媒介化后形成的视觉中有声源的与无声源的空间与音乐的集合方式。她论述了这四种亚型形成符号修辞的四体演进的格局,昭示了音乐—空间在人类文化中的渐次变化,同时也是文化的声音空间实践的体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何一杰则对“噪音”进行了符号学分析,他在《符号学噪音研究初探》中以意义为出发点,对噪音进行微观的深入和宏观的把握,意在从中梳理出一些离散概念的脉络,探索一条文化研究的新思路。同是来自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于广华在《音乐视觉性的发展与视觉文化转向》中认为,传统音乐注重音乐本身,人们只是去单纯地听音乐,但是现在更多的是“看音乐”,当下,呈现出流行音乐传播媒介的视觉化、流行音乐表演的视觉化、流行音乐创作的视觉化。音乐视觉性的强化势必损害了音乐固有的美感和韵味。

叙述声音、声音修辞、空白等与文化的联系是学者们讨论的重要方面。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刘勇博士作了《黑暗中的声音:作为叙述者的电影解说员》的报告,认为在默片时代,电影叙述者有可能会现身发声,以电影解说员的身份叙述故事。电影解说员通过他的声音与表演将默片与戏剧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凸显出来。江西师范大学刘碧珍副教授在《从声音到叙述声音》中认为,“声音”是重要的叙事学研究对象,视觉文化盛行之后,人们开始在声音的比喻意义上讨论叙述声音,因为叙述声音能呈现叙述主体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关系,能帮助文本意义的生成与传达,所以无论是对于创作还是阅读而言,意义都十分重大。南昌工程学院教师周莉莉在《韦恩·布斯的“倾听修辞”》中指出,劝说修辞以言传递权威之“声”,解构主义认为修辞之言可以生成多样之“声”,而对于倾听修辞来说,“声”在言外。这声音既不对应“真理”言说,也不是言说自身的众声喧哗,而是聆听和吸纳自身言说之外的他者声音,寻求与他者的共同立场。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涂年根博士在《于无声处听惊雷:论听觉叙事中的静寂》中认为,作为声音文本的“空白”——“静寂”是一种重要的声音叙述形式。静寂在叙事中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有些声音叙述者无法发出,某些特定事件无法用声音叙述出来,为了达到无声胜有声的叙述效果。静寂传达方式主要包括直陈法和反衬法,对静寂的倾听要听之以心而不是听之以耳,静寂在听觉叙事交流中的价值主要有修辞价值和增殖价值。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周志高副教授在《听觉叙事对虚构世界的建构》中考察了听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捕捉叙事作品中的声音,可以更好地感知其中的诗学节奏、内涵意义、社会历史文化等;通过智性的聆听,建构音景,使叙事凭借视、听双翼翱翔在可能的世界。在谈及声音与文化的具体例子时,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日籍博士生上田五月在《为什么日本人过

年不放爆竹》中对比了中日两个民族的年俗,认为日本人过年不放鞭炮的三大原因是:日本人把过年鬼神的来临视为福神而不愿放炮竹驱赶;与大自然为友不惧怕象“年”这样传说中的怪物;愿意倾听而不干扰大自然的声音。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赵海涛博士所作的题为《〈多情多恨〉中的“Love”与“恋”》的报告则从日本传统文学中的色事“恋”与西欧文学的舶来词汇“love”出发,对小说《多情多恨》中的男主角的恋爱观和作品整体的恋爱关系进行廓清,向大家介绍了作家尾崎红叶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的一种介于传统色事与西洋“love”之间的第三种恋爱模式,让与会人员再次感受日本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

听觉研究不是一般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在一种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下的研究。听觉研究应从多种维度进行,既要从源流学考察、借助特定“工具”考察(如前述王馥芳教授的考察),也要从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文化意蕴考察。参会专家学者热情饱满、各抒己见,多角度众声奏鸣,使得既有命题的讨论更具有有一种现实价值和文化关怀。

三、“听觉叙事”:多维立体的文学批评实践

随着学界对“图像至上主义”的批判和对“听觉”的日益重视,关于听觉、听觉叙事的研究日益增多。本次研讨会上,众多学者提交了“听觉叙事”方面的报告论文。这些论文从生态伦理、民族身份、音乐美学等角度,对戏剧、小说、影视等艺术形式中的听觉叙事展开深入分析。这些报告中的批评实践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跨越时空,跨越文体和艺术类型,形成了对听觉叙事的多维立体性研究,这也是对前述理论问题探讨的回应。

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他们在听觉叙事、听觉与文化研究过程中对具体文本的思考。学者们首先讨论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声音表达、听觉叙事与文化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罗良功教授在题为《诗歌声音与美国文学独立》的报告中认为,声音是自我表达与族群内部交流的重要手段,美利坚民族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经历形成了民族内部的声音认同,罗良功教授分别以瓦尔特·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为例,分析他们如何以自己创造性的声音实践开创了与英国和欧洲诗歌传统分道扬镳的道路,推动了美国文学的独立:惠特曼将物理声音改造成为情感外渗的通道,同时与美国社会认同关联以赋予突出的文化意义,建构起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而狄金森常常因为声音来改变用词和句法、常规拼写和排版,将声音物质化不仅获得了视觉印记,同时在语义和语法上都深深地打上烙印,从而反叛英国诗歌传统、改造英国语言。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茂生教授作了题为《济慈诗歌中的音景与生态伦理——以〈夜莺颂〉〈秋颂〉为例》的报告,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夜莺颂》和《秋颂》为例,结合听觉叙事中的重要概念“音景”与文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重点阐释了济慈诗歌中的“音”与“景”的和谐统一与生态伦理追求。济慈的诗歌中不仅有注重视觉的“风景”,更有以声音为特殊景观的“音景”,两者相互辉映,构成了大自然的生态伦理秩序,彰显了和谐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由此表现了诗人不同于常人的对真与美的独特感受力。西北大学梅晓云教授作的报告《S.拉什迪小说的“声象”写作初探》,以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代表作《午夜之子》为例,指出这部小说里有丰富的文学之“象”,作家创造了一个由语象、物象、味象、色象、声象构成的“象的网络”,其中“声象”写作是这部小说的重要方面。作家的现实感悟和历史观,不是以思想文本的形式而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象的符示”来传达的。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刘亚律副教授在《〈包法利夫人〉的听觉叙事》中指出,人文科学领域正在悄然发生重视听觉的革命,这为重读现实主义小说经典《包法利夫人》提供了新的角度。该小说里的声响具有强大的“语力”,也是其叙事戏剧化艺术的重要手段。声音在《包法利夫人》里可以视作核心事件,它以“集束”音景的方式,叙述了一个追求畸形浪漫的女人的悲惨故事。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陈静副教授在《聆听生活:〈达洛卫夫人〉中的听觉叙事与音景》中从听觉叙事与音景角度,研究英国作家伍尔夫如何在《达洛卫夫人》中借助一系列听觉叙事与诸多声音景观聆听生活,小说中的听觉叙事对于进行人物转换与推进叙事进程有重要作用,真实的音景与幻觉的音景形成可闻的存在并蕴含生活的思考,小说中的听觉叙事与音景显示了声音的力量及声音与意识流动的交融。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陈国女在《哥特小说与声音》中指出,哥特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人萦绕在恐怖的氛围当中,从而产生惊悚、恐惧之感。而这种惊悚、恐惧之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小说当中的声音。声音的特性让恐惧

感愈加强烈:一是声音的模糊性,让人对它充满着猜测和想象;二是声音传播的现场感,容易让人卷入到声音营造的立体环绕的听觉空间中而难以逃离。

与会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听觉叙事也给予了多维度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卢普玲副教授在《试论〈史记〉中的听觉叙事》中,认为《史记》中的声音叙述,不仅体现在“拟声”、“听声类声”与“听声类形”等听觉叙事形式上,甚至也体现在说话者的语气、声调和重音等相关的声音信息上。这些都帮助我们“从听”的角度重新认识《史记》的价值。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兴泰副教授在《〈诗经〉听觉叙事论》中认为,《诗经》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声音的描摹,后世文学作品无出其右。周人与大自然之间天然无间的联系使大自然声音成为《诗经》中的重要音景,而发达的音乐文化造就了《诗经》中丰富多彩的音乐之声。江西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徐丽鹃博士在《周代礼乐教育制度下“六诗”之传播》中认为“六诗”伴随周代礼乐制度衰落及诗歌传播方式的转变,讽谏教化的文本功能特征突显,由“声义并用”转向“义”教的新阶段,最终形成诗有“六义”的教化体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袁演在《赋体寓言的叙事疗救功能分析》中认为口传性质和听觉叙事,是瞽矇和乐师讲诵寓言故事的主要模式,反映了早期赋体寓言的活态文学性质。师旷、淳于髡以及《庄子》《列子》中大量虚拟的身有残疾者,是具有“通神功能”的叙述者,他们在讲诵寓言的过程中创造出通神通灵的神圣语境,实现了文学的叙事疗救功能。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罗小华在《噪音和权力——孔子音乐美学思想解读》中从诗教即乐教、音乐即秩序、尽善尽美的审美理念、崇雅乐斥郑声的艺术评判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深入剖析孔子音乐美学的政治内涵。在孔子看来,雅乐与郑声,和谐与噪音,秩序与颠覆的相较,不仅仅是艺术评判,也是价值体系和权力之争。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欧阳江琳副教授在《〈长生殿〉“以乐叙事”探赜——以“霓裳羽衣”为中心》中认为这部音律上“句精字研,罔不谐叶”、敢与临川争胜的剧作,可由听觉叙事的新视角,深入聆察其中层出叠现的音乐,分析作者“以乐叙事”的独特匠心。九江学院文传学院徐波博士在《芭蕉声里催诗急——论古代文学中的“雨打芭蕉”意象》中认为,雨打芭蕉意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听觉意象。中唐之后,雨打芭蕉由重视视觉欣赏向重听觉欣赏演变,雨打芭蕉呈现出声韵、节令、地域等丰富的美感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杨志平副教授在《〈红楼梦〉听觉叙事刍议》中认为,《红楼梦》中的听觉叙事较为普遍,它极大地提升了小说自身的艺术价值,对凸显小说多重意蕴起着重要作用;听觉叙事有力地推动了情节演述,成功地强化了人物塑造,精妙地传达了小说寓意,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诗化意味。

少数民族文学和儿童文学当中的听觉叙事具有独特的美学和文化认知价值,值得深入探讨。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曾斌博士在《少数民族小说中的听觉叙事与民族身份认同》中认为,少数民族小说中听觉叙事丰富。神授艺人、行吟诗人闭着眼睛吟唱,屏蔽共时性的现实,使得声音具有了历史性,声音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南昌工程学院教师易丽君在《儿童文学中的听觉叙事探析》中通过“重听”经典作品《柳林风声》来感知儿童文学独特的“听觉叙事”,认为儿童文学不仅通过“拟声”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里创造出无限纯美之声,同时又保留了各种“人物”的个性之音。儿童文学运用“听声类声”和“听声类形”等声音叙事技巧唤醒读者的听觉记忆,激发读者的思维想象去欣赏“声形交融”的视听世界。

此次会议专门就“听觉与文化”论题展开研讨,在国内学界尚属首次,其开拓性意义不言而喻。国内学界德高望重的专家们聚会洪城,就“听觉与文化”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见解,让与会者“听”到了学术真知和见仁见智的大家争鸣。会议的召开必将推动听觉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 (加)梅尔巴-卡迪-基恩. 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A]. (美)詹姆斯·费伦,彼得·拉比诺维茨.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C]. 申丹,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 肖惠荣,曾斌. 叙事的无所不在与叙事学的与时俱进——“叙事的符号与符号的叙事:广义叙事学论坛”综述[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1).
- [3] 傅修延. 听觉叙事初探[J]. 江西社会科学,2013(2).

(责任编辑:张立荣)